

中美大学教育 体验与比较

美国知名华裔学者访谈录

COMPARATIVE EXPERIENCE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terviews with Prominent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张海惠 采访/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本书由对来自美国各著名大学的15位华裔知名学者的访谈集结而成,比较了中美两国大学的管理方式、教学事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机制以及与中美大学各学科教育相关的问题,展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及海外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热切关注。本书对于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大学教育体验与比较:美国知名华裔学者访谈录/张海惠采访/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300-12996-9

-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高等教育-对比研究-中国、美国
IV. ①G649.21 ②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0408号

中美大学教育体验与比较——美国知名华裔学者访谈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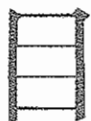
张海惠 采访/编著

Zhongmeidaxue Jiaoyu Tiyan yu Bijiao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 邮政编码 | 100080 |
| 电 话 | 010-62511242(总编室) | 010-62511398(质管部) | |
| | 010-82501766(邮购部) | 010-62514148(门市部) | |
| |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 |
| 网 址 |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 |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
| 印 刷 | 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 | |
| 规 格 | 160mm×230mm 16开本 | 版 次 | 2011年1月第1版 |
| 印 张 | 15.25 | 印 次 |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
| 字 数 | 189 000 | 定 价 | 39.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策划编辑: 闫 景
责任编辑: 姜良余 徐海艳
封面设计: 王强工作室



| 人文科学

| | |
|---|----|
| 中美大学不同的艺术教学体制 | 4 |
| 美国大学里的比较文学专业 | 21 |
| 从内文化、跨文化及超“个体”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兼谈美国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 | 36 |
| 史学：学术与技能之结合 | 56 |
| 美国的四年制文理学院与人文教育 | 69 |
| 理解并尊重其他文化的宗教学教育 | 80 |
| 中美考古学的教学和实践 | 90 |

| 社会科学

| | |
|------------------------------|-----|
| 何人何时如何获取何物——美国大学的政治学教育 | 108 |
| 基于通识 成于执著——中美社会学教育之我见 | 122 |
| 谈中美大学的经济学教育 | 138 |

| 商业、传播学、法学、教育学、信息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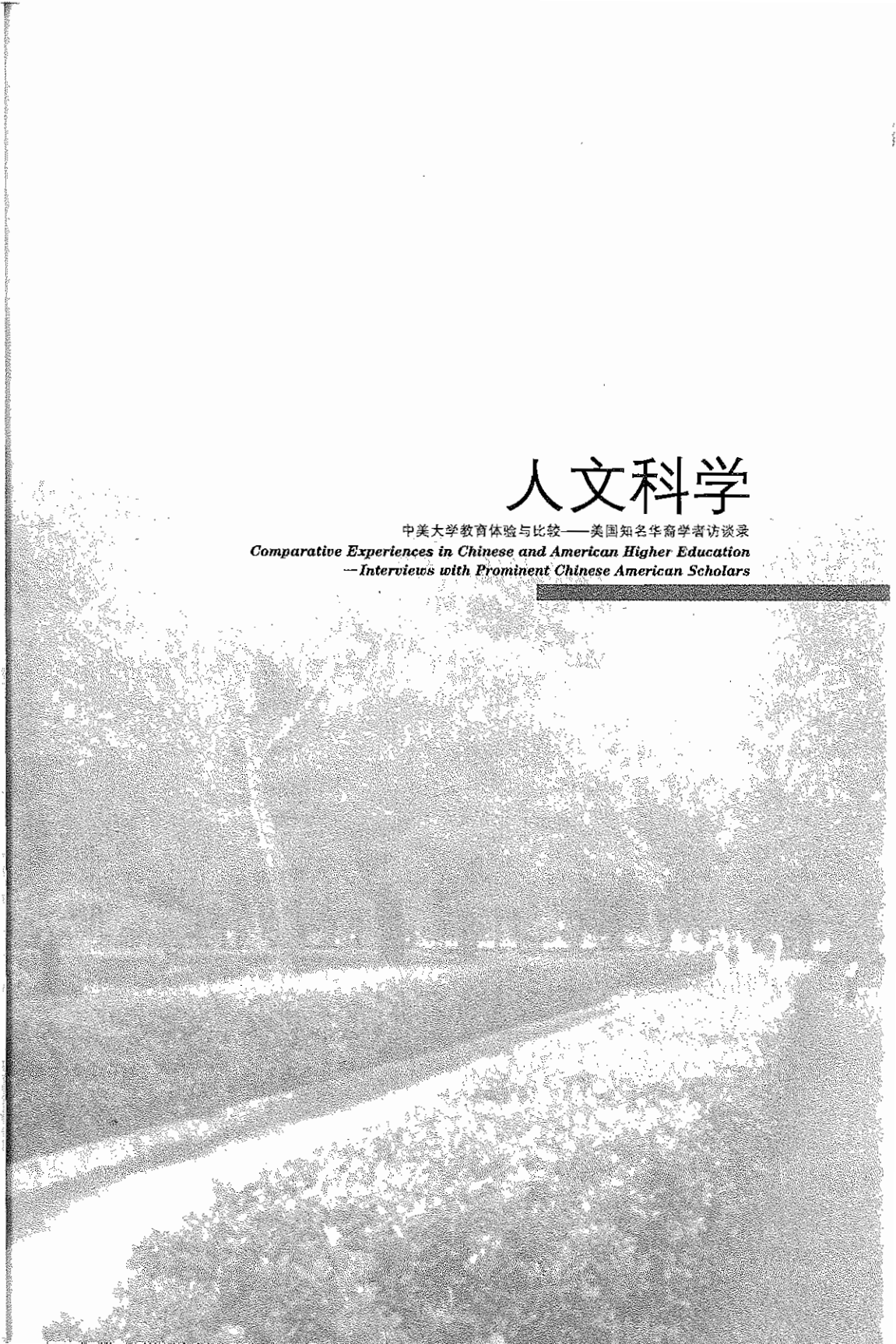
| | |
|--------------------------------------|-----|
| 美国商学院教育及学生应具备的技能 | 152 |
| 育人为本，方能授术——传播院系中的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 | 164 |
| 美国大学里的法学教育——JD 与 LLM 和 JSD 的比较 | 184 |
| 美国大学的教育学院——公平教育是永远的话题吗？ | 196 |
| 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信息学教育——兼谈与中国的比较 | 211 |
| 后 记 | 222 |

人文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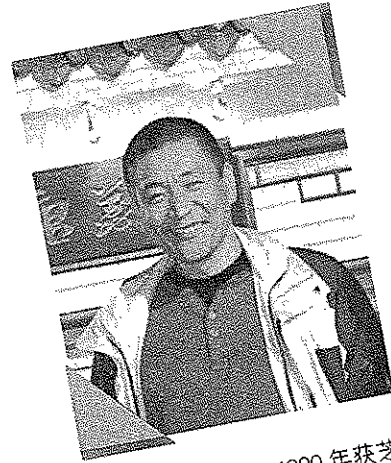
中美大学教育体验与比较——美国知名华裔学者访谈录

Comparative Experience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 Interviews with Prominent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中美大学教育体验与比较——美国知名华裔学者访谈录
Comparative Experience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terviews with Prominent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唐文方，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90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匹兹堡大学和艾奥瓦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现任艾奥瓦大学斯坦利华夏主任教授 (Maxwell and Elizabeth M Stanley Family and Hua Hsia Chair)。曾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主要著作包括：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 (with William L Paris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Workplace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Loca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3)；Chinese Urban Caste System in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with Qing Yang, 2008)；等等。目前的研究兴趣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民意变迁与政治变革。



何人何时如何获取何物——美国大学的 政治学教育

受访者：唐文方

采访时间：2009年4月13日/2010年4月14日

采访地点：匹兹堡大学唐文方办公室/艾奥瓦大学唐文方办公室（电话采访）^①

张：唐教授，感谢你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唐文方（以下简称唐）：不客气。

张：你在北京大学接受大学本科教育，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至今已经在美国大学教了近20年的书，其间还在国内几所大学讲学。这种经历使你对美国和中国的高等教育情况都比较了解。我想请你就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在政治学专业教育和科研的方方面面，作个系统的比较。

^① 2009年4月13日采访后不久，唐文方就职艾奥瓦大学。应唐要求，2010年4月14日以电话采访方式对采访稿予以修订。

唐：比较可以，但谈不上系统，只是一些个人感受。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的本科生教育比美国强，但中国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科研和教授聘任制度不如美国。

张：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看法，能不能谈得具体点儿？

唐：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本科生教育有两点长处：第一，中国学生的基本功比较扎实，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比较系统，虽然有背书之嫌，但一些基础知识是必须具备的。知道的东西多了，自然会举一反三。第二，相对美国来讲，国内大学里的教授在教学上花的时间比较多，自然对学生有利。在美国大学，特别是一些重点研究型大学，对教师的考核以科研为主，教学不是首要的，特别是本科生的教学，这样就会影响本科的教学质量。

张：那么，你认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唐：美国大学本科教育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商业性太强。比如我曾经任教的匹兹堡大学有3万多名学生，每年预算的90%左右来自学费，只有10%左右来自州政府拨款。教师的工资、学校设施的改造等都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于是为了追求入学率，不合格的学生也收。学校有时候会给教师压力，说你得看情况，不能给太多的不及格，给一两个就差不多了。研究生成绩的水分更大，对懂行的人来说，如果一个学生得了个B⁻，就意味着其真实成绩是不及格，B就相当于刚刚及格。这种压力让教师不得不降低教学标准，否则教师自身的生存就会成问题。当然，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通过政府补贴让教师收入不直接和市场挂钩。

可惜的是，国内的大学现在也同样面临市场压力。我在国内某著名高校教课时，班里面有20几个韩国留学生，期末时只有两个考得不错，其余的最高只有50几分。这些韩国学生来中国就是想交钱混个学位，不是因为语言问题学不好，而是不用功，好几个学生百分制只得了一二

十分。后来，学校领导让我改成绩，说不及格的太多，会影响外国留学生生源。没有了生源，系里老师的收入就会下降，所以我只好把成绩改了。而班里的中国学生最低的都能得 80 分。

张：大学教育管理中表现出的这种情况和社会的大环境有关。

唐：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更是和美国的文化有关。应当肯定，美国非常强调学生的自主能力和独立性，这也是许多中国学生初到美国后感到很不适应的原因。从国内到美国念研究生，入学后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念哪些课程完全由自己决定，这非常锻炼学生的自主能力。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不到 20 岁的学生，思想变化非常快，完全把这种自由交给学生，如果缺乏适当的指导，少数人能把握住自己的前途，得到充分的发展，但不少人很容易不知所措，造成混乱。我就知道一个美国学生，人很聪明，又善于交际。大学一年级的時候，他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学感兴趣，于是开始念中国文学。念了一年后，觉得中国文学还不真正适合他，又对中国经济感兴趣了，第二年转成经济专业了。念了一年经济，说经济太枯燥，数字太多，还是念考古吧，中国考古很有搞头。正好我的一个同事要到内蒙古赤峰去做一个考古挖掘，他就跟着那位老师去了，回来后又觉得考古不适合他，要改念音乐。毕业后，他到中国去了。后来我见到他，问他在做什么，他说在当模特。这小子长得挺精神，个儿挺高，说是走在大街上就被一个模特公司给选中了。当了一年模特，又要当电视节目主持人，去广播学院学了不到两个月就受不了了，又跑出来了。回到美国，没有工作，只好在饭馆当服务员，后来又回到中国在一家银行工作。这些年他始终在改主意，尝试各种机会，这对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很有好处，但从社会来讲，也浪费了用来培养他的大量资源。这种现象在美国并不少见，不少美国大学生，你问他们毕业后想干什么，很少有人有长远的计划，一般都是先到欧洲旅行一趟，回来看情况再说。这种社会状况可能让每个人享受充分的自由，但对社会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浪费。

张：中国则是走了另一个极端，学生一上大学就分专业，也不能轻易改专业。很多孩子还没有真正明白自己喜欢什么，适合做什么，而是靠家长做主来选择专业，即使没有兴趣，也得硬着头皮学。所以，许多中国学生和家长很羡慕美国大学本科生前一二年不必确定专业的做法。

唐：当然，两种做法各有利弊。我认为应当给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权利和机会，但也应当针对年轻人不够成熟、变化快的特点，有适当的引导。

张：下面想请你谈几个和中美大学政治学教育有关的具体问题。来美国以前，我对中国大学的政治学专业设置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当然现在的情况和我 30 年前上大学时候的情况不同了。但是，似乎政治学在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中仍不能算是大系。来美国后，我注意到政治学在美国是一门名列前茅的主要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学生源源不断。美国政治学学会曾经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叫《政治学的学习和职业：给本科生的指南》(Career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 A Guide for Undergraduates)，介绍了主修政治学的几大特点，其中之一是说修政治学有助于掌握任何工作都需要的一些有用的技能，比如与人沟通的技能、从事研究的技能、分析的技能等等，还列出了一长串有政治学本科背景的人可以从事的工作，从政府部门到非营利机构，从国际事务到教育，从新闻界到法律事务，从调解员到数据管理员，等等。而在中国，许多人根本不了解政治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有人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治学的通俗化及其与社会生活结合得不够。你怎么看？

唐：先说说政治学是什么样的学问。政治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从古希腊就开始了。如果说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的产生，政治学研究的就是财富的分配。曾经有人写过一本关于政治学的书，书名叫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何人何时如何获取何物》)，很精练

地概括了政治学的内容。细说起来,政治学研究的范畴很广,从国与国之间的财富争夺和分配,到领导人的产生及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政府部门的形成和职能、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媒体和社会舆论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从革命、暴力、示威、请愿,到选举、税收、医疗、就业等等,只要与财富分配有关的,都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而现代政治学与古典政治学的区别之一是更加注重发展针对具体问题的理论,而不是寻求像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所发展的无所不包的宏观理论,例如媒体和民意的关系、民众在什么条件下会参与选举等等。现代政治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实证性,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任何理论,即使讲得再好听,如果无法通过数据来证明,就没有价值。政治和政治学不同,很多人对政治都有自己的观点,说起来一套一套的,但大都局限于自身所在的环境。研究政治学的人,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应当是经过事实证明的,而且这个证明的过程必须是透明的、别人都能接受的。

至于为什么中国人对政治学还缺乏了解,可能是因为这门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被取消后,直到80年代后才在国内的高校中被重新接受。另一个原因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过去中国对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即财富分配问题,是不容讨论的,而在现代社会中,财富分配是一个科学问题。

张:具体到中国大学政治学的本科教育,你认为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唐:我觉得有几点需要加强。第一是应当教育学生学会用事实说话。提出一个观点后,要用事实来证明。在美国做研究,有时候事实比观点更重要。观点谁都有,比如对于是不是应当对伊拉克开战,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饭馆服务员都能跟你说出一大套来。例如有人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不打不行,但到底有没有,这需要证据,需要花时间去调查研究,还需要有尊重事实的态度,

这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了。因此,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的差别有时并不在于你能不能抡圆了侃,而在于你能不能发现客观事实,哪怕事实与你想象的不一致,也要尊重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中国大学社会科学在这方面的训练应当加强,不能自诩“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而是要注重掌握第一手材料,注重实地考察,注重实证。秀才不出门,永远也无法知道天下事。当然,不同专业有不同的专业技能训练,但不论哪个专业,尊重事实、言之有据是个基本要求。它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治学态度问题。

第二,我觉得国内本科生,不仅仅是政治专业的学生,应加强学术写作的基本训练。学习怎样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这应该是一个知识积累和练习思考问题的过程。在美国,学生看完一本书要写一篇文章,内容包括:书里说了什么观点,是如何证明的,你同意不同意,为什么。这是一个训练独立思考能力的过程。但是中国学生,包括已经出国的,往往照抄书里的话,这在美国叫剽窃,是学术写作中最忌讳的。我有一位美国同事曾经发现他班里的一个中国学生在开卷考试中成段地抄书,按照美国的规矩,这样的情况应该给零分。这位老师还不错,考虑到这里面可能有文化方面的差异,来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说,据我所知,中国学生不会故意剽窃,抄书在中国会被容忍,因此学生并不知道这是学术大忌。结果这位同事总算没有让这个学生不及格,但告诉他下不为例。

再有,中国的文科教育有时忽视读书的消化过程。读书是要将书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下,与自己的经历和以前的想法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同一本书,每个人看后的感想是不同的。在美国,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掘每个学生的独特想法,而不是追求同一性。有些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虽不剽窃,可以用自己的话讲出一本书的内容,但缺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其实做老师的有时候很想知道学生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让学生简单重复已有的观点。

张:这是关键。提倡独立思考,让学生有独到见解,学生才不

会人云亦云，才会去消化和思考，产生自己独到的东西。此外，再加上必要的训练，才能在根本上消除“剽窃”。当然，道德品质败坏，有意抄袭是另一回事儿。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美大学的学生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学习特点。我想问一个和这个有关的问题。在你的教学活动中，有没有遇到过学生因强调自身权益而与老师的教学发生冲突的事情？

唐：当然有。美国学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学校成立有学生会。学生会当然对维护学生权利有好处，但有时也滥用权力。比如说，有一次考试，有个学生来找我，说他不能参加规定时间的考试，让我给他另开“小灶”，另出题。我说，你为什么要搞特殊？我为什么要另出题？他说他是学校学生会主席，要陪校长出席一个活动，如果我不同意，他就要走法律程序，找我的系主任，找文理学院的院长，甚至校长。后来，他果真找了我的系主任，上来就递给系主任他的学生会主席的名片，系主任倒被他吓住了，让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花点时间专门给他写考试题，我也没办法，只能照办。但这种用滥了的权利意识实际上影响了我的正常教学工作。

张：开个玩笑，一种权力使用的合理范围也属于你们政治学研究的范畴，真不愧是学政治学的。你觉得生长在一个所谓开放、自由的国度里，美国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的知识接受度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以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接受各种观点？

唐：这不能一概而论。就拿我们政治学来说，其实，美国教育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是非常重的。比如谈到中国，美国学生早在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被“洗脑”了，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一片黑暗，人权不好，政府不好，等等。你要是告诉他们中国有什么做得不错的地方，他们很难接受。你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大的耐心，去消除他们的一些偏见，有时候很不容易。比如讲到计划生育，美国人一说就是

你们侵犯人权，不允许老百姓有生孩子的自由。我常常对美国学生讲，你有自由去相信计划生育是违反人权的，但是你如果上我的课，也同时必须知道中国这样做的道理（即保障和提高现有人口生存权的必要性）。考试的时候，你支持或不支持哪一种观点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要的是你应学会把两种观点系统地阐述出来，不光知道计划生育如何违反人权，还要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口，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多少，可耕地面积比美国少多少，平均每人能享受的自然资源比美国少多少，人均收入比美国低多少，然后再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你可以说你的人权问题，但你也必须知道中国方面的说法。这在中国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要让美国学生明白实在需要很大的耐心，因为一些学生的偏见太深。像我这样一个中国人，如果一上来就说计划生育必要，他们会说因为你是中国人，当然向着中国说话。所以还不能一上来就说他们有偏见，你要说从人权的角度看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计划生育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是违反人权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即中国的人口压力、资源缺乏以及人口过多为将来世界能源与环境造成的压力来看，计划生育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你这么说，有些学生能接受，但有些学生完全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还是不容易接受。所以，长期的反共宣传和“洗脑”有时候会影响美国大学的教育质量。

张：除了有偏见，这是不是也体现了美国学生敢于持与老师相左观点的态度？当然偏见和持与老师相左的观点还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既然说到这儿，你能不能谈谈中美学生在和老师有不同观点时的表现？

唐：前两年，有学生向州政府报告，说教师向学生强加政治观点。结果，州政府特地派调查小组到学校来调查，学校还向全体教师发通知，要求在课上不能强迫学生接受老师的观点。但是，如果老师要求学生了解两种对立的观点，哪怕是强迫学生去了解，也是无可非议的。

张：再说说研究生教育。

唐：应当承认，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是有许多优点和长处的。美国的研究生教育非常提倡思考能力的培养。上课是互动式的，不是老师在讲课，学生在底下记。你看了书，我也看了书，咱们坐在一起互相讨论，没有老师和学生之分。老师会针对书里的内容问几个问题，但是也不一定有标准答案，而是靠互相讨论甚至是辩论来上课。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课堂上的学术气氛很活跃，老师和同学之间常有辩论，最终的结论是讨论出来的。国内的教学方法则不同，学生比较习惯于单向和被动地接受，哪怕是研究生教学也是这样。有一年，我在国内的一所大学给研究生上课，期末考试时学生问我，老师你这课讲完了怎么没笔记可记呀？我们考试怎么准备呀？我说这门课的结论和观点，就是咱们讨论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那些东西，就像是思想火花，你应该记的是那些东西，但这种东西是不确定性的，没有标准答案。考试的时候，只要你能在课上内容的基础上有自己的观点，又能自圆其说，就说明你学到了东西了，就能得好成绩。我可不要你只能背出我在课上说了些什么。

张：你说得没错。我接触的一些中国学生，主要是那些社会学和人文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国内都是学习尖子，从名牌大学来的，可到美国一上课，就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对课堂的讨论插不上嘴，除了语言障碍，主要是对这种授课方法不适应，上课时有一种游离在外的感觉，进而就有了失落感。你所接触的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表现出了怎样的特点？

唐：如果以研究中国政治为例，中国学生对中国的感性了解当然比美国学生多，中文更不用说了。但我发现有的时候训练美国学生反而更容易，因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中感情色彩不像中国学生那么重，更容易脱离以前听来的观点客观地看中国。这里主要指的是研究生。但在英文写作方面，即使是研究中国，中国学生也不占便宜。

张：你能不能说说中美两国高校政治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的差别及其短长，比如理论课与方法课的比例，必修课和选修课对学生知识结构的影响，等等？

唐：前一段时间我在国内的一所大学给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和老师讲课，发现他们问的问题都是和政治哲学有关的。事实上，在美国政治学教育中，这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少了。当然，在美国各个学校的情况会不一样。据我观察，总的趋势是更加注重实证方法的训练，例如如何收集和处理数据。中国政治学的全面恢复至多只是过去 20 年的事儿，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起步都晚，师资力量短缺，不少老师都是从马列主义哲学方面转过来的，真正受过现代政治学系统训练的老师还远远不够。

张：下面我们换个话题。早期有关中国的研究被称为“汉学”，以欧洲为中心，主要侧重于哲学、语言文字、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后来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汉学”也逐渐被“中国学”所代替。那么，就美国的中国研究来看，你觉得在过去几十年中表现出了怎样的特点？

唐：在美国，中国研究的趋势从比较注重历史背景和文化的研究，转向了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先说说美国是怎么开展对中国的研究的。一般来说，从事中国研究的有三种机构：第一个是大学，对理论问题、历史问题、背景问题研究比较多。第二个是智囊团（think tank），比如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等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私人机构会跟美国政府签订研究合同，你给我钱，我给你研究中国空军目前的技术装备，或者中国金融业的现状、问题及将来的发展趋势，等等。第三个是政府部门，其中有一些研究中国的机构，主要是搜集情报，例如中央情报局和 United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的有关部门。

以前,想了解中国的政治走向,要看《人民日报》头版。几个领导人怎么排名,讲话字里行间透着什么意思,这个是老一代人研究中国的方法。现在,在美国研究中国最好的方法是到中国去掌握第一手材料。比如我有个朋友,是学人类学的,研究云南纳西族。他到大理附近的一个村里住了一年,整天跟村里的老人聊天,了解村里的历史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回去才把博士论文写出来。现在美国主流的、比较好的大学里面的研究生、博士生,要想研究中国,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

张:最近我看到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一位教授写了一篇美国中国政治研究的概述文章。文章把迄今为止在美国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学者分为四代。其中第三代包括了一批80年代以后从中国来美国接受博士教育后,在美国各大学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并有相当成就的学者,其中也包括你。你能不能说说在美国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各自的优势?

唐:有时候,我和有同样背景的中国学者凑在一起聊天,会说到美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了解远远不如我们,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但是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反而在美国的政治决策中起更大的作用。比如卡特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专门管中国政策的人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美国人。第二届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政策的人也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教授。我和这两个人都聊过天,他们中文说得不利落,对中国的了解书本知识比感性认识多。我们对中国了解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他们,但是我们为什么反而没有他们那么有影响力呢?开始我觉得可能是美国人种族歧视,他们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白人。后来,时间长了发现其实不然,还是我们不如他们。美国人虽然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他们对美国的切身利益了解得比我们多。中国人可能了解中国,但不管你在美国住了多久,甚至即使加入了美国籍,仍不免从中国的角度和利益来看中国的问题。比如中国有航天飞机了,

他们立刻想到的是,这件事在今后对美国的利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会这么去想问题,起码不会很自然地去想。我们会想中国怎么发展出来的航天飞机,分析制度上的因素、技术上的因素、劳动力的因素,以及对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影响,跟人家说得头头是道。但如果人家问你,这对美国二十年之后的切身利益的影响在哪儿,那还真的要好好想想,说起来也不那么自如了。美国人在这点上绝对比我们会说。

张:尽管如你所说,但包括你在内的一批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美国学术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比如,哈佛大学的 Elizabeth Perry 曾指出,近些年在美国政治学研究领域最出色的学术成就就是由中美研究者合著的一些著作。你的那本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① 是其中之一。我想知道,以你和 William L. Parish 的合作经验,你认为有着中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共同进行研究时,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是否会影响到你们的合作?或者是更有利于双方对问题的思考?

唐:我觉得不管与谁合作,都要能与对方合得来,有默契。中美学者合作的好处在于能去除双方的偏见,使研究成果更客观全面,对中国和美国读者都有意义。

张: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是否存有偏见?

唐:应该说研究中国的一些美国学者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在一个学科中,比如政治学、经济学,要想把中国介绍给其他同事,要很费一番工夫。你要是说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哪里不好,那很容易被接受,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有这个印象。但你要是说中国有哪些积极的东西,就很难入美国学术界的主流,我指的是观点。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一所名牌大学教中国经济,但没有评上终身制。为什么呢?不是他的水平不

^① Wenfang Tang and William L. Parish,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行。他匿名审稿的文章发表得挺多，但他的主要观点是说，中国发展的经验证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完全靠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策的调节作用也很重要。这个观点对美国人来说是不能被接受的，美国人说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市场资本主义，是私有制。你要用中国的经验来修改美国的主流理论，不可能。所以即使你再好，也不能接纳你进入这个掌握着美国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命脉的特权俱乐部。在政治学领域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美国人认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中百姓才能影响政府决策，你要是说中国的百姓也能影响政府决策，并有社会调查数据来证明，他们会告诉你不可能，肯定是你的数据错了。

张：你在艾奥瓦大学除了教学与研究工作外，作为斯坦利华夏主任教授，有什么想法和规划？

唐：当然是加强中美之间的交流，交流多了，隔阂就少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政治学领域的老师和学生能到艾奥瓦大学来访问和学习，艾奥瓦大学政治学系在实证研究方面在美国是名列前茅的。

张：再次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中美大学教育体验与比较——美国知名华裔学者访谈录
Comparative Experience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terviews with Prominent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s



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高级研究员。1982年在复旦大学学士学位。先后在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香港科技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现在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社会学系的客座教授。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组织社会学和社会分层。其英文著作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1949—1994* 于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参与合著的 *The Dynamics of Rules* 于2000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书稿《组织社会学十讲》于2003年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另编辑或合编两部论文集。其多篇英文学术文章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和组织学的刊物上，中文学术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刊物上。